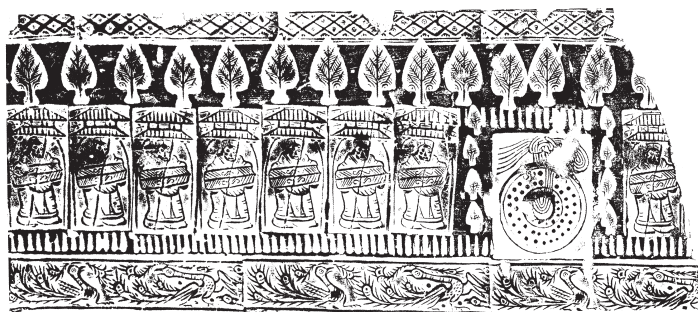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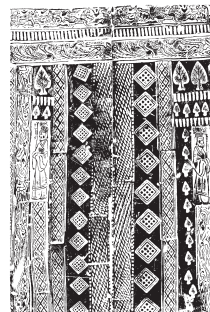
〔图十一〕扶沟县出土执盾武士菱形乳丁纹画像残砖拓本
采自周到、王景荃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画像砖》页197，图二一，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图十二〕许昌禹县出土山林狩猎菱形乳丁纹画像砖局部拓本
采自周到等编：《河南汉代画像砖》，图八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图十三〕开封尉氏县出土山林狩猎菱形乳丁纹画像残柱拓本
采自前揭周到、王景荃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画像砖》，页194，图一八



〔图十四〕周口西华县东斧柯村出土山林狩猎画像砖柱河南博物院供图



2. 扶沟县出土一块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长方形执盾武士画像残砖，上部模印一行菱形乳丁纹〔图十一〕^{〔1〕}。

3. 许昌禹县出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山林狩猎画像砖，上、下各有一行菱形乳丁纹作为边饰，中间四行主体纹饰相同，均为山林狩猎画像〔图十二〕^{〔2〕}。

4. 许昌博物馆收藏一块长葛县出土武士执盾空心画像砖，其左边框凤纹下以菱形乳丁纹作为边饰^{〔3〕}。

5. 开封尉氏县出土一件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山林狩猎空心画像砖柱，下半部分残缺。柱身模印三列作为边饰的菱形乳丁纹〔图十三〕^{〔4〕}。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一块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山林狩猎画像砖，据说出土于郑州，中间主体纹饰为四行模印山林狩猎纹，上、下两端各模印一行菱形乳丁纹作为边饰^{〔5〕}。通过和许昌禹县出土山林狩猎画像砖拓本的认真比对，笔者认为这两幅画像砖拓本应是拓自同一块画像砖，出土地点仍是许昌禹县。

除了上述画像砖模印菱形乳丁纹之外，还发现有变形菱形乳丁纹资料。如河南博物院在东斧柯村征集到仙人戏凤画像砖，下部边饰为一行变形菱形乳丁纹。此外，还有一件山林狩猎画像砖柱，在柱头、柱身及柱础分别模印一至两行变形菱形乳丁

〔图十五〕大英博物馆藏人像柱上模印的圆形飞鸟纹



〔1〕 前揭周到、王景荃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画像砖》，页197，图二一。

〔2〕 周到、吕品、汤文兴编：《河南汉代画像砖》图八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3〕 前揭黄留春《许昌汉砖石画像》，页22—23。

〔4〕 前揭周到、王景荃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画像砖》，页194，图一八。

〔5〕 《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砖全集·2·河南画像砖》页25，图二四，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

〔图十六:1〕汉代画像砖墓门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 徐津供图



〔图十六:2〕汉代空心画像砖
许昌博物馆藏 牛爱红供图



纹〔图十四〕^{〔1〕}。另有一对西华县石羊城出土的画像灰陶阙，阙身两侧边缘模印变形菱形乳丁纹^{〔2〕}。在西华县征集到画像砖、砖柱上的变形菱形乳丁纹，其特点是每个菱形单元线条不是闭合的，位于中间圆圈加点的乳丁纹，已简化为一个实心小点。从其设计风格来看，应是与菱形乳丁纹一脉相承，年代有可能晚于前者。

（3）圆形飞鸟纹

大英砖柱人像肚脐部位模印一圆形飞鸟纹〔图十五〕，柱头、柱身两侧印有圆形飞鸟纹，此类纹饰亦见于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一对汉代画像砖墓门〔图十六：1〕。该墓门于1924年购自张静江开办的通运公司^{〔3〕}，在墓门上部均模印一行五枚圆形飞鸟纹。馆方推测这对墓门来自河南郑州，今根据许昌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砖来看〔图十六：2〕，二者纹饰有诸多相似之处。流失海外的这一对墓门有可能出自许昌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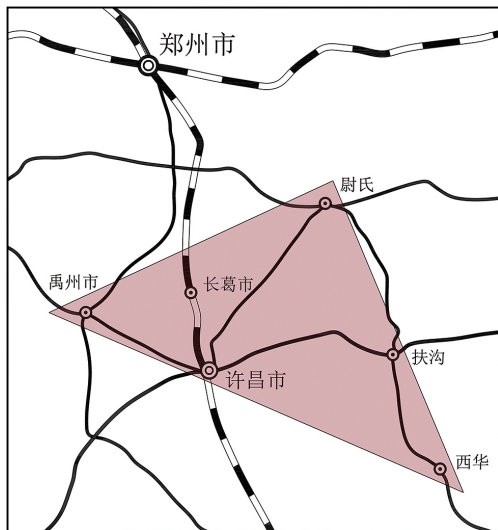
据已发表画像砖资料分析，双龙衔尾纹画像砖主要出土于河南周口西华、扶沟两县及许昌长葛县。菱形乳丁纹画像砖的分布区域，北到开封尉氏县，南至许昌市，西达禹州市，东至扶沟、西华两县，形成三角形区域〔图十七〕。从整体来看，大英博物馆人像柱的出土地点应该是在今河南郑州以南的周口、许昌一带，而非郑州。

〔1〕 前掲周到、王景荃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画像砖》，页298，图二四。

〔2〕 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页127，图版一一三，大象出版社，2002年。

〔3〕 据徐津博士告知。

〔图十七〕双龙衔尾菱形乳丁纹画像砖地域分布图
孙祥绘图，底图采自毛忠民主编：《最新实用河南省地图册》页1-2，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9年



2. 大英人像柱的年代判断

大英博物馆研究人员认为，这件人像柱属于东汉时期。关于此柱断代研究的不利条件，是河南周口、许昌地区主动发掘的汉墓数量较少，缺乏公开发表的汉代空心画像砖墓考古发掘资料，缺少断代依据，只能根据数量相对较多的征集品材料，因此会影响到对大英人像柱年代更为细致的判断。通过将这件大英人像柱柱身三种纹饰与上述中国河南境内同类纹饰的比较，并综合考虑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西汉晚期十二字铭文瓦当、河南洛阳涧河西岸东汉早期墓M14兽形砖柱等间接材料（后详）^{〔1〕}，可以大致判断该砖柱年代应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二）大英博物馆人像柱出土时间推测

大英人像柱入藏该馆时间为1942年，而有关人像柱的发现、流传经过及出土时间，均缺少直接的文字记载。笔者只能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略作推测。

大英人像柱出土及流失海外情况复杂，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外国工程师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收集包括人像柱等挖出来的文物，分批寄回国内。许昌、长葛均在京汉铁路线上，周口扶沟、西华两县则位于铁路线东侧附近。1897年下半年，卢汉铁路开始分段修筑，北段由卢沟桥至郑州黄河北岸，南段从黄河南岸至汉口。1905年9月，南北两段铁路相继完成。1906年4月1日，这条铁路全线通车，同时改称“京汉铁路”^{〔2〕}。根据京汉铁路的修筑进度来推测大英人像柱的出土时间，约在1897—1905年之间。

在中国近代铁路线的修建过程中，遇到古墓并挖出器物的情况时有发生，也有墓中出土遗物被外国人收集、寄回国内的现象。1910—1925年，河南洛潼铁路修筑之际，英国工程师报告所得唐代明器，包括人物俑、动物俑及器物等共计57件，现藏大英博物馆^{〔3〕}。1915年4月，罗振玉曾赴河南洛阳考察，陇海铁路工程局局长徐世章告诉他：“铁道总医官欧洲某国人所得古物甚多，得即寄归，不能知所得为何物也。”^{〔4〕}柯昌泗亦云：“陇海铁路兴筑时，于开封沙镇得汉画一石，题字十六榜，有减谷东门等字，减谷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页64—65，图版四〇：1、2，文物出版社，2005年；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30.14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2〕 苏生文：《中国早期的交通近代化研究（1840—1927）》页186—187，学林出版社，2014年。

〔3〕 转引自郑德坤、沈维钧：《中国明器》页59—60，燕京学报专号之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Hobson, R. L.,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London*, pp.26-27, 1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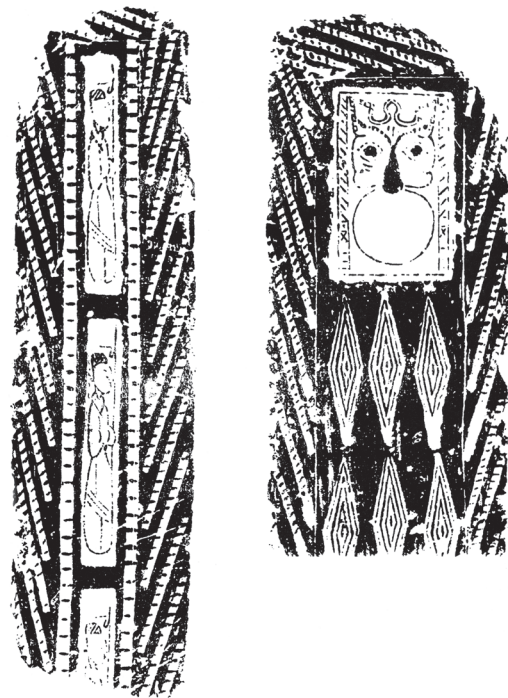
〔4〕 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页1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即函谷，同音之假借。其石即时为西洋人马龙携至法京，闻今在美国。”^{〔1〕}

上述文献记载所及现象还得到了出土资料的印证。1989年1月，在河南省郑州市陇海马路东段郑州铁路管理局招待所，发现空心画像砖、北魏减地平雕画像石各一块。其中空心砖画像为执戟门吏与铺首衔环图〔图十八〕。这两块画像砖石是该所在院内挖排水沟时发现的，没有其他遗物伴随出土。招待所分东、西两个院落，原为陇海和京汉两个铁路管理局所在地。1909年1月1日清政府虽从外国人手中赎回两条铁路的所有权，但仍为外国人管理。所以，发现的两块画像砖石应是从别处运来，因故滞留埋入地下的^{〔2〕}。

大英博物馆人像柱发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大量汉墓遭到破坏，发现诸多作为建筑构件的画像砖。国内外的古董商人深入中原内地，收集这些画像砖，将其卖到海外。如上文提及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一对汉画像砖墓门即是如此。该博物馆文物库房里的其他一百余块墓砖，则是1925年购于日本山中商会^{〔3〕}。中国古代明器流失海外之始，罗振玉认为源于清末：“光绪丁未冬，予在京师，始得古俑二于厂肆。……明年春，复挟诸明器来，则俑以外伎乐、田宅、车马、井灶、杵臼、鸡狗之物，悉备矣。亟予厚值酬之，此为古明器见于人间之始。是时，海内外好古之士尚无知之者。厂估既得厚赏，则大索之芒洛之间。于是，邱墓间物遂充斥都市。顾中朝士夫无留意者，海外人士乃争购之。”^{〔4〕}“光绪丁未”，即1907年。1932年，燕京大学教授郑德坤对于古明器的发现与流失情况亦有记述：“近年来，中国内地铁道工程振兴，古坟的发掘处处遇到。一九〇五年以后几年，汴洛路开始建筑时，洛阳附近古迹被发掘者甚多，引起外人技师等的注意。西欧人士既多争搜集，中国市场上商估遂大事搜索以求售。其结果遂引起多方的注意，去专事发掘，而古明器之流出国外者日众。”^{〔5〕}基于上述历史背景资料推测，大英博物馆藏人像柱至迟在20世纪40年代初流入英国境内。

〔图十八〕郑州铁路管理局招待所出土汉代空心画像残砖拓本
采自陈立信：《郑州发现北魏石刻》，《华夏考古》1990年第4期，
页53，图三



〔1〕 (清)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二，页102，中华书局，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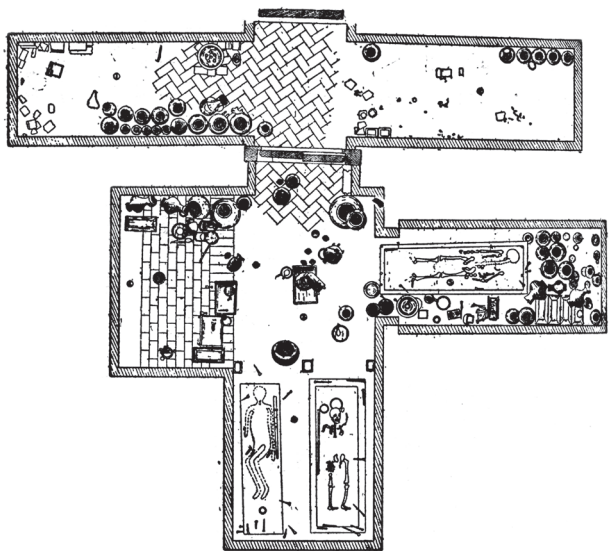
〔2〕 陈立信：《郑州发现北魏石刻》，《华夏考古》1990年第4期。后有学者认为，这件北魏石刻是近代伪作，参见张雪芬：《对郑州发现北魏石刻的再认识》页89—93，《南方民族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

〔3〕 徐津博士提供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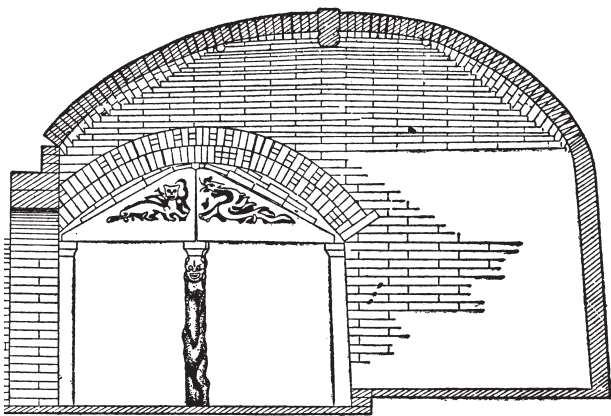
〔4〕 罗振玉：《古明器图录》序言，上虞罗氏景印，1916年。

〔5〕 前揭郑德坤、沈维钧《中国明器》，页10。

〔图十九:1〕洛阳涧河西岸东汉M14平面图



〔图十九:2〕洛阳涧河西岸东汉M14墓室隔墙立面图
采自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30.14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图二十〕复原于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的M14墓室隔墙



大英博物馆的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其馆藏人像柱发现于河南郑州,可能是砖柱出土后被运到了郑州,再由此中转,寄往海外,海外人士根据所寄地址来确定发现地点。

三 大英博物馆人像柱的性质与功能

作为一件独立的砖柱,大英人像柱陈列于该馆中国馆汉代文物展柜的中央,凸显出该馆对其珍视的程度。遗憾的是,这件藏品已失去原始的出土信息,其所在墓葬中的位置及其性质、功能,均为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河南洛阳涧河西岸东汉早期墓M14兽形砖柱的剖析(以下简称“兽形柱”),以此来复原大英人像柱在墓葬中的位置,探究其作为墓室建筑构件所具有的性质与功能^{〔1〕}。

(一) 洛阳涧河西岸东汉墓M14兽形砖柱的性质与功能

1953年5月,在洛阳修建金矿公路的过程中,于涧河西岸发掘一座东汉早期墓M14〔图十九〕^{〔2〕}。后将此墓搬迁、复原至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在其前堂与后室之间,用空心砖砌筑了一道隔墙,上部是两块略呈三角形的空心砖,砖上镂空加阴线刻出龙虎形象,施以彩绘。因年深日久,彩绘不存。支撑两块空心砖的下部是一件立兽形浮雕砖柱〔图二十〕。此砖柱上的立兽,左前肢上举,右前肢按一物〔图二十一〕。兽形柱通高120厘米(包

〔1〕 2017年5月9日,大英博物馆研究员辛文元给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写信,希望馆方提供M14浮雕立柱与透雕门楣的正面图片,将作为改陈后大英博物馆中国馆人像柱的背景展板。这一陈列构思与笔者的研究思路不谋而合,后因图片未能反映该墓原貌而未采用。据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徐婵菲女士提供的信息。

〔2〕 前揭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30.14号汉墓发掘简报》。

括栌斗，斗高10厘米)，宽16.5厘米^{〔1〕}。该砖柱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考古发掘品。

这件兽形砖柱与其上部空心砖阴刻镂空的龙虎图像组合在一起，想要表达什么寓意呢？洛阳地区出土汉墓壁画、空心砖及铜镜等也有相似图像组合。

1993年，洛阳市涧西区丽春西路202厂汉墓M92出土一面尚方四神博局镜，镜背外区装饰一周铭文带，其中有云：“左龙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敞金石如侯王。”^{〔2〕}结合其他图像实例，可以看出龙虎图像组合，不仅能辟邪除凶，而且还能福荫后代子孙，其趋吉辟邪、保墓安宁的含义是明显的。从洛阳涧河西岸M14兽形柱所处墓室内的空间位置来看，它具有两方面功能：一是作为承托砖柱上部两块空心砖的重要支撑；另一个是与上部的龙虎形象构成新的组合，形成镇墓辟邪的寓意。

可与其相互印证的例子，见1973年山东省苍山县城前村北发掘的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画像石墓。其前堂与后室相接的北中立柱刻双结龙，画面高86厘米、宽21厘米。墓内题记云：“中直柱，只（双）结龙，主守中霤辟邪央（殃）。”^{〔3〕}柱上所刻双龙具有辟邪除殃的作用，前堂与后室相接处的中柱应是文献所记“中霤”。

“中霤”之“霤”，意为屋檐水，引申为屋檐，借指屋宇、房屋。《说文·雨部》：“霤，屋水流也，从雨，留声。”^{〔4〕}“中霤”，亦写作“中廡”、“中溜”，指室中央，见于先秦文献及后代学者的注疏中。《楚辞·刘向〈九叹·愍命〉》：“荆谗贼于中廡兮，选吕管于榛薄。”王逸注：“中廡，室中央也。廡，一作霤。”^{〔5〕}《礼记·月令》所载“其祀中霤，祭先心”，源于《吕氏春秋·季夏纪》。郑玄注：

〔图二十一〕M14墓室隔墙下的兽形柱 李波摄影
1.正面 2.侧面 3.后侧面 4.背面



〔1〕 2018年11月6日，徐婵菲女士对位于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的M14前、后室之间隔墙下兽形柱进行了测量，并将尺寸告知笔者。
〔2〕 褚卫红、朱郑慧：《洛阳发现的汉代博局镜》，《文物》2008年第9期。
〔3〕 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方鹏钧、张勋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1980年第3期。
〔4〕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第十一下《雨部》，页241，中华书局，1985年。
〔5〕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刘向〈九叹·愍命〉》页302—303，中华书局，1983年。